



论高职院校外语教学改革的四个“性”

代天善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55)

摘 要: 高职院校外语教学改革的四个“性”,即公共性、人文性、语言性和衔接性。当前盛行的“职业型”外语教学改革的理念与实践是在更为基础的语言层面上重蹈二十年前“复合型”外语教学改革的覆辙,学科属性模糊,衔接貌似神离。本文质疑这一理念的可行性及其相关的课程体系及教材建设。当前高职院校的“职业型”外语教学模式既无助于专业能力的提高,也有违语言教学的认知规律,阻碍正常语言能力的发展。

关键词: 职业外语;公共性;人文性;语言性;衔接性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2) 02-0050-05

50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二〇一二年第十一卷第二期(总第五十八期)

2004 年教育部高教司印发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简称《教学要求》),胡壮麟(2004)对此作了发言,题为“21 世纪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四个走向:个性化、协作化、模块化和超文本化。”《教学要求》多次提到课程设置“要充分体现个性化(individualized)”,“考虑不同起点的学生”,教学模式应“朝个性化学习、自主式学习方向发展”。协作化(collaborative)是指语言学习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既包括同学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师生之间的互动。模块化(modular)则强调大学英语的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应朝适当分层、分化、分工与分类的方向发展。另外,《教学要求》倡导“应大量使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推进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英语教学”。这就是胡先生提到的超文本化(hypertext)。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的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CALL,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也都始料未及,以多媒体(multimedia)、超媒体(hypermedia)、网络化、开放化、公

开课(open course)为特征的当代教学形式极大地丰富了大学外语的教学。

关于教材编写和课程设置,《教学要求》提到:“各个学校应当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确定本校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并以此为基础设计自己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该课程体系不仅包括传统的面授课程以外,更应注重开发基于计算机或网络的大学英语课程,将综合英语类、语言技能类、语言应用类、语言文化类和专业英语类等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以确保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方面得到充分的训练和提高。”从当前的情况看,教材的丰富性得到了极大发展,市场份额的争夺也异常激烈。但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两极局面。大学英语教材既不需要过去那种一家独揽服务全体的格局,也不需要各自为阵封己守残的割据。前者过于单一,但值得庆幸的是局面已经打开;后者过于繁杂,更加需要疏导,避免走得太远而违背语言教学的认知规

收稿日期:2012-03-11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厅课题“高职院校学生学习质量评价研究”(项目编号:2009TJK018)。

作者简介:代天善(1971-),男,湖北洪湖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生成语言学,语言教学与语言哲学。

律。另外,胡壮麟先生提出的四个“化”讨论的是外语教学的形式层面,仍未触及语言教学本位的实际内容。

有鉴于此,本文提出高职院校大学外语教学、教材建设和课程设置不应偏离如下的四个“性”:即公共性、人文性、语言性与衔接性。

一、公共性

语言的公共性是语言固有的属性,语言的公共性还可以理解为语言的普遍性或通识性。随着大学的扩招、专业的细化、行业语言与职业语言的倡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大学外语的教学和教材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对口,越来越注重应用价值,以至于一个专业一套教材,一个系部一套教材抑或一个班级一套教材的做法愈演愈烈,严重脱离了语言的公共性。当前,这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教学理念在部分高职院校十分盛行。实践表明,大学公共英语,尤其是高职英语在学生尚不具备应有的语言基础时超前进行专业细化的做法,不仅达不到预定的教学目标,而且对大学公共外语或高职公共外语的教学形成了一定的阻碍。“职业型”外语教学模式的诸多方面和做法一方面最大地压缩了公共外语教学的公共性;另一方面,在低水平层次实行了最大的专业细分。从长远和整体的角度看,它将语言教学的效率降至了最低,不利于学生当前和未来外语能力的发展。

大学公共英语的教学与教材不能脱离与割裂语言的公共性。然而,高职院校的职业外语却在改革的口号下急剧膨胀,职业外语的专业化趋势正在蔓延开来。这里除了巨大的利益驱使和推行者的教学认知缺陷外,还存在一个对外语专业相当普遍的误解:外语工具论。“外语工具论”视外语为一种工具,为一种技能,一种载体;而只有当外语与某一载体相结合,才能形成所谓的专业。职业外语教学的做法正是如法炮制,在更为基础的语言层面上与各个专业强行苟合,形成了遍地开花的所谓的职业外语。我们看到,在有些学校,大学公共外语部的教师被分配到机电系去教授机电英语,被分配到医护系去教授医护英语等等。从专业的角度看,公共外语部的教学延伸至各个院系的专业领域,美其名曰创新,实则越俎代庖,令人质疑。从学科属性的角度看,“职业型”外语教学模式的改革忽视了外语教学的学科地位,迎合了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外语工具论”,否定了外语教学的独立性。

作为思想、文化和科技的交际手段,语言的确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不可或缺的工具。毫无疑问,语言具有工具性,但语言的工具性绝非语言的全部属性。在当今世界,外语被广泛地当作交际

工具使用,只表明它本身的重要性和运用的普遍性,绝不因此改变它的本质属性。蓝仁哲(2009:5)指出,社会上流行“外语工具论”,非外语专业人士视外语为工具,完全无可厚非,因为外语在他们手里的确是在当作工具使用和发挥作用。而外语教学专业圈内,如果也把外语视为工具,必然会忽视外语专业和外语教学的学术内涵,放弃外语专业应有的学科地位,从而有意无意地降低了外语教学的培养水准。

语言的公共性与各个领域及语言教学领域自身的专业性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矛盾。相反,语言教学领域自身的专业性既可促进本领域的健康发展,又可保障语言通达各个专业领域的运用。当前,培养人文通识型通用人才已成为国际教育界的基本共识。西方学者胡森在论述大学教育的任务时指出:“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中,个别的本事很容易过时,无论是政府机构或是私人公司都认识到使用受过良好教育的通才是有益的,这些通才受过训练能够使用分析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胡文仲、孙有中,2006)。在此背景下,“职业型”外语教学模式的改革理念要么欲速不达,要么僵硬有余而灵活不足,继而影响外语教学和学生外语能力的正常教育。

耶鲁大学是重视人文通识教育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基于“不是为了职业,而是为了生活”的办学理念,“它开设人文教育计划课程培养学生宽容、尊重、公正和坦诚的精神,开设古代和外国文化艺术课程培养学生超越自己洞察时代的能力,开设社会科学课程培养学生思考人类命运的见识”(ibid,2006:245)。大学公共外语教学和专业外语教学本应成为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平台,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从而实现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修养和科学素质的宏伟目标。高职院校的公共外语教学和专业外语教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理应遵循人文通识教育的基本办学理念,超越过于职业化取向和着眼于短期办学效益的“复合型”、“职业型”、“行业型”、“无缝对接型”等培养模式。

二、人文性

人文性强调教学与教材内容的思想性,传达一切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教学与教材内容应崇尚理性,反对蒙昧,宣扬科学民主,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等。随着大学外语教材的多样化、职业化、专业化和实用化,体现人文价值和理想追求的选材越来越被当作是无用的内容被排挤出大学外语的教学内容,让位于实用性、针对性、功利性的产品说明、功能保养、操作流程、广告宣传等内容。本文倡导,21世纪的大学外语教材应该重拾优良传统,教

学内容不仅能够满足时代要求和社会需求，更应以人为本，重塑科学人文职业精神。不仅要注意知识的传播，还要培养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工具及对知识对象的鉴赏能力、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和创新能力。

职业外语教学改革盛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业内对外语专业教学和外语公共教学存有模糊不清的认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忽视了外语教学的人文学科属性。人文学科是“人学”，其鲜明的特点在于它关注人，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旨在塑造、培植和净化人的灵魂，提高人的人文修养与素质，提升人的生存境界。作为人文学科的外语专业教学和外语公共教学，不仅要操练好学习外语和使用外语的基本技能，还必须在教学过程中播撒语言知识、人文知识、科技知识的种子，培养具有融汇中西、跨越中外人文视野的思辨能力。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发挥外语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在各自的职业岗位上为中外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的全面交流与融汇作出特殊的贡献。

另外，本文认为，不论是专业外语教学还是公共外语教学，不应只考虑市场需求和市场效应，更应考虑大学教育的根本目标。高职院校的外语教学应该回归人文学科本位，提高语言基础技能，培养人文通识型的外语应用人才。背离语言的公共性与人文学性，不仅限制了学生未来的职业应变灵活性，而且有违外语教师的专业精神和人文使命。

四川外语学院蓝仁哲(2009:5)指出，“外语教学只有明确了自身的人文学科属性，才能找到专业的学科定位；有了明确的学科专业定位，才能确立适当的专业培养目标，不至于把外语专业培养等同于外语技能培训；面对外语教育发展的机遇，才不至于头脑发热，盲目开设外语专业或扩大招生数量。外语专业切不可丧失人文学科的本色，学好语言是为了深入人文领域。人文教育是切实有效的素质教育，把外语教育从人文教育中分离出来，单纯强调外语的交际功能、实用性与工具性，这是功利主义的取向，本身就是与人文学科的宗旨背道而驰的”。

西安外国语学院刘伟(1995:23)认为“培养目标转型所带来的淡化人文教育的倾向是外语院校发展的致命伤。”他指出：注重人文教育，是传统外语专业的一大特色和优势，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外语专业注重人文教育的传统正在一步步丢失……各类人文课程被大幅度削减，课时大幅度压缩。……这种弱化人文教育的现象在全国各级各类教育中具有普遍性。这也是许多国家在重点发展经济时所共有的现象。功利主义成为教育的指导原则。实用性、应用性教育成为潮流。这种教育哲学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人文精神的大衰落。国民中物欲化倾向、粗俗化倾向、冷漠化倾向、躁动化倾向、无责任倾向、虚假化倾向日趋严重。

上述各家，但不限于上述各家之言，纷纷点出了外语教学淡化或背离人文学科属性的种种弊端及其背后的种种原因。本文认为，外语教育必须坚持把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放在首位，反对片面的市场需求决定论。“职业型”外语教学改革言必称市场，言必称职业，言必称效益，实则由局部、短期、巨大的功利驱动，将导致整个教育机体以致受教育者个人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作为语言基础低于“复合型”外语教学模式的一个翻版，“职业型”外语教学改革模式弱化了外语专业的学科地位。

三、语言性

语言性主要是指外语教学和教材选材的综合品质，包括课文题材、风格、文体、长度及行文的地道流畅和思想的健康积极等。在课堂教学中，教材是教师指导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依据，教材也是学生学习外语的主要信息来源。因此，教学和教材的选材如烹饪对食材的选择一样重要，应该把语言性置于优先地位考虑，兼顾语言认知的一般规律。高职院校的外语教学和普通高校的外语教学一样，都必须遵循外语教学一致的普遍规律，教学层次和教学类型的不同都不足以改变外语教学的核心宗旨。片面和一味地强调高职院校的外语教学的特殊性容易导致教学性质的主次不分，忽视语言教学的主要问题。须知，语言教学自有语言教学的规律，相比高职院校，普通高校更有细分和兜售公共外语教学的借口和条件，更有“职业型”外语教学改革的市场和潜力。

当前颇呈燎原之势的“职业型”外语教学改革在教材的编制、教学的实施以及成绩的评定等多个方面违背和颠倒了一般的语言认知次序，深浅不分，先后不分，里表不分。显而易见，公共的、共核的语言能力可以通达任何精深的专业认知和职业认知，而削弱和削减这一共核能力与知识的沉积犹如人未过河，桥已先拆。桂诗春(2005)在阐述外语教学的认知基础时强调，“从交际目的、教学重点向词汇转移和以语言形式为焦点的角度来说明外语教学是一种面向意义的活动。”根据当代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Chomsky)的观点，“语言本质上是一个意义系统，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思维工具；但对交际功能而言，语言却并非一个最佳的设计”(代天善，2011)。所以外语教学是“一种面向意义的活动”，“教学重点向词汇转移”。各个语言的语音、词汇总体而言是任意性的，是语言的接口和外化，是外语学习的主要内容。另外，桂诗春(2005)的“以语言形式为焦点的角度”也符合当前生成语言学的研究结论。语言的屈折形态系统、动词的词性转换、语序参数等语言之间的参数性差异特征的确成为当前外语教学的坚实理论基础。相比之下，面向数以万计的“职业”分工，分头实施公共

外语教学的做法是何等的衔接低效与资源浪费。

高职院校的大规模诞生是伴随大学扩招而形成的，要建立相应的外语课程体系和外语教学模式既要深入调研学生主体，也要深入探索高职院校外语教学的培养目标。司建国(2005)、赵继政(2005)对中国高职学生英语学习的策略进行过广泛的调查；陈平文(2007)在教学实践中对高职英语教学的方法论问题，结合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实施教学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总结；龚兵(2009)对高职英语教学的词频效应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杨石乔(2008)对高职院校的优秀生和学困生在听力策略上的对比研究等从小处着眼，基于对高职院校学习主体的充分理解，提出了深刻见解。由此可见，高职院校的外语教学，除了徒流形式的“外语+专业”的教材编写外，仍有大量工作和相应领域期待展开深入研究。譬如，高职院校外语教学中的目的语输入问题，根据观察与调查，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大量“职业型”的课文选材出自按照英语语法和中国人思维模式写就的语言材料，过于偏重语言材料的时代性和情景性，忽视了语言材料的品质优劣。编写外语教材应既考虑其语言和内容能够反映快速变化中的时代，也应重视语言材料的覆盖面和认知度。毕竟，超过专业领域的内容自有具备资质的专业教师去教授。

其次，教材目的语输入的内容过于格式化、僵化。教材的编写如果采用“填鸭式”的集约完成，没有自己教学实践的积累、收集、消化、剔选等过程，虽然表面上看似光鲜耀眼，五脏俱全，实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学生所接触的目的语应该是处于各种各样语境中的、真实地道的语言，尽量出自真正的行家、专家、大家之手。语言内容不宜编造，思想性强，生动流畅，活泼健康，否则学生不仅学不到真实地道的语言，而且学习外语的兴趣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另外，目的语输入，也就是教材的选材必须考虑学习主体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语言信息应该符合学生当前的认知能力和已有的语言基础，应该是学生能理解的语言信息和知识信息，否则就是对牛弹琴，有损语言教学的正常进行，打击学生外语学习的积极性。

四、衔接性

衔接性涉及的问题是教学内容和教材内容的跨度，它直接影响教学实践的有效度。急功近利的灌输往往欲速则不达，“外语+专业”的简单捏合，看似一举两得，实则拔苗助长，学生既没有学好外语，也没有学好专业。教学和教材内容的衔接性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层次。首先，是中学英语和大学英语的衔接性。现存的问题是，大学英语教学是教育部高教司抓的，高中英语教学由基础教育司来管，两家单位

应该有更多的接触和规划。当前，中学英语教学和大学英语教学两者各行其是，自成系统且互相脱节。由于中学英语教学大纲的制定和教材编写与大学英语教学的大纲制定和教材编写是两套班子，衔接性受到很大影响，而且，教材普遍求全责备，重门叠户，整体效率受到一定的拖累。

其次，是大学公共英语和大学专业英语的衔接性。时下，大学英语的公共性和基础性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忽视，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培训性质的实用文体，并冠以形形色色的实用标签。结果是一些现实生活中常见、常用而学生又想急于了解的通识内容，学生却并没有掌握。期冀越过大学英语的公共性和基础性直奔应用、实用、职业、行业、专业乃至即学即用的主题和做法往往导致严重的负面结果。另外，教材内容与社会现实之间永远存在一定的距离，但不足为惧。语言内在的属性和加强开放公开的教学形式会自然缝合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以及职业个体之间的语言距离。

最后，是教材内容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衔接性。一套较好的教材不仅仅只从技术衔接上立体化，而且应该是开放的、非封闭的、可补充的、可选择性的。总之，教材编写既要继承我国外语教学和外语教材编写中的优良传统，又要吸纳当代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最新成果，努力培养优秀的外语人才。蓝仁哲教授(2009)指出，“教材建设对每个专业都称得上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有一个机构来统筹规划，组织具有专业学术水准同时又富有教学经验的学者精心设计和编写。教材编成后应先有一个试用过程，再经过同行专家评议、认可或修订，才予以推广使用。当然，也不反对教材编写多元化。但是，教材编写决不可放任自流，遍地开花，美其名曰发挥积极性或突显地域特色。市场机制下的教材百花争艳，往往难以避免一些弊端：教材无论良莠，编了就用（在自己所在地区、学校或教课的班级强行使用），结果必然影响教学质量，甚至误人子弟。”另外，胡壮麟教授(2005)也总结了由此类现象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如哄抬的教材价格、学生购书的经济负担、编者低廉的稿费或版税等。

五、结语

上个世纪90年代是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呼声最高的时期，也是围绕“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进行教学改革的主要阶段并引发广泛争议和批评。有学者(胡文仲，2009)指出，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个别院系开设过多的相关专业课程，对于学生的外语实践能力的训练有所忽视，学生的语言基本功，特别是阅读和写作能力有所削弱。英语专业本身学科特点和学科建设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影响。就全国

而言,英语及其他通用语种的专业点设立过多过快,教学质量有所下降。

20 年后的今天,我们又重新面临类似的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改头换面,在更为基础的语言层面上以“职业型”外语人才的说法再次出现,本文对此深表质疑。更有学者(蓝仁哲,2009)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才培养的核心是质量而不是模式。外语专业应该回归人文学科本位,致力于培养人文通识型外语人才。在新一轮外语教学改革之际,我们应当首先探讨外语教学的人文学科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这两大根本性的问题,让各种不同的见解汇聚一起,集思广益,取得基本一致的共识,不然,很难深入到外语教学改革和发展的其他具体问题。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难题,许多院校盲目推行“职业型”外语人才的培养,随意设置课程,语言基础、语言共核、语言文化一类的课程受到严重挤压,毫无人文风气,尽失学科本色,功利之心突显,浮躁之风盛行。对此,我们也许惟有求真务实,克服弊端,才能真正开启高职院校的外语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 [1] 陈平文.英语教学新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2] 代天善,“刺激的匮乏:尚待努力的课题”述评[J].现代外语,2011,(2):202-207.
- [3] 龚兵.阅读附带词汇习得中的频率效应[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4).
- [4] 桂诗春.外语教学的认知基础[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4):243-249.
- [5] 胡文仲,孙有中.突出学科特点,加强人文教育:试论当前英语专业教学改革[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5):243-247.
- [6] 胡文仲.新中国六十年外语教育的成就与缺失[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3):163-169.
- [7] 胡壮麟.新世纪的大学英语教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1):24-27.
- [8] 胡壮麟.大学英语教学的个性化、协作化、模块化和超文本化[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5):345-350.
- [9] 蓝仁哲.高校外语专业的学科属性与培养目标:关于外语专业改革与建设的思考[J].中国外语,2009,(6):4-8,16.
- [10] 刘伟.关于外语院校培养目标转型的几点思考[J].外语教学,1995,(4).
- [11] 司建国,赵继政,贺梦依.中国高职学生英语学习策略调查[J].国外外语教学,2005,(1).
- [12] 杨石乔.非英语专业高职优秀生与学困生听力学习策略对比研究[J].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08,(3).
- [13] 赵继政.高职非英语专业学生词汇学习策略调查[J].国外外语教学,2005,(3).

[责任编辑:向丽]

On the Four Fundamental Aspect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form at Highe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s

DAI Tian-sh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enzhen Polytechnic, Shenzhen 51805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our fundamental aspects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form a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the commonness, humanities, language orientation and the bridging problems, respectively. It points out that the current reform of foreign language for career follows the track of the overthrown composite cultivation model put forward 20 years ago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its humanities nature and the loss of its disciplinary status. The paper argues against its feasibility and the idea behind, questioning the relevant course system and textbooks compilation. It concludes that the model of foreign language for career contributes nothing to specializ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holds back the normal language development.

Key words: foreign language for career;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form; commonness; humanities; language orientation; bridging